

# 丝绸之路就是一条“丝绸”之路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丝绸之路”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给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交通路线所起的名字,因为他认为古代的贸易以丝绸为主。以后这一路线不断延长、拓宽,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之路,已经无可非议。但是,是用什么来冠名这些道路,学者之间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应当叫“玉石之路”,有的认为应当称“佛教之路”,也有的觉得应当叫“陶瓷之路”“茶叶之路”“青金石之路”“金刚之路”……,这些都是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强调了中西交往之路的某一方面,从整体上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名字能够取代“丝绸之路”。其实,这不仅仅是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习惯的说法,还因为丝绸之路的确是一条“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丝绸”是一个包含较广的词汇,即包括生丝,也包括织造好的丝织品。而丝绸又有许多种类,如绫、罗、绸、缎、锦等等,因此,我们所说的“丝绸”是指用丝制成的各种各样的丝织品,有的价格昂贵,有的比较一般,但总比麻布、棉布质地要好。

有关中文典籍中丝绸西传的材料,以及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记录和实物证据,前人已经做过很好的梳理和研究,如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三秦出版社,1992年)、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赵丰主编《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中华书局,2009年)等。本文主要根据出土文书的记录,从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来看丝绸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唐代中期以前,丝绸的主要产地是关中、河南、河北、四川地区,以后江南的丝织业发展起来,逐渐取代北方。丝绸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轻,便于作为商品携带远行,而且价值稳定,因此常常取代金属货币,而成为远行贸易中的等价物。正是因为丝绸可以大量运输,而养蚕缫丝的技术也逐渐沿丝绸之路西传,因此丝路上的一些城市,逐渐成为丝绸的重要中转地,丝绸在这些地方王国、城镇当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以吐鲁番盆地的古代高昌地区为例,这里原本为车师人所居,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在高昌屯田,盆地东半部以高昌壁垒为中心发展起来,盆地西半部则以车师王国都城所在的交河为中心。公元327年,前凉张骏建高昌郡,下辖高昌、田地等县。此后,高昌先后隶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sup>1</sup>。439年北魏灭北凉,北凉王族沮渠无讳、安周兄弟由敦煌经鄯善,于442年北上占领高昌,高昌太守阚爽奔漠北柔然汗国。沮渠兄弟建立高昌大凉政权,并于450年攻占交河城,灭车师国,大凉政权统一了吐鲁番盆地,为此后近二百年的高昌王国奠定了基础。444年沮渠安周即位后,南联刘宋,东拒北魏。当时北魏内部斗争激烈,除了妥善安置车师王国君主等外,也无力西进去歼灭北凉余部。安周偏安一隅,好景不长,最终在460年为强悍的柔然消灭。柔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sup>2</sup>。

在高昌郡时期(327-442年)和高昌大凉政权时期(442-460年),高昌地区已经有了自

<sup>1</sup>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105-235页。

<sup>2</sup> 荣新江《沮渠安周碑》与高昌大凉政权》,《燕京学报》新5辑,1998年,65-92页。

己的蚕丝业以及相应的丝织生产<sup>3</sup>。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也使我们获得了同一时期整个西域地区保存下来的许多丝织品实物。据吐鲁番南面鄯善王国的佉卢文文书和考古发掘资料，可以得知当时鄯善国使用丝绸的情况，其丝绸品大多数应当是从中原运来的。近年在吐鲁番发现的447年前后的《高昌计费出献丝帐》和《高昌计口出丝帐》，是我们认识吐鲁番地区丝绸重要性的两组关键文书。

先引比较完整的一段《高昌计费出献丝帐》<sup>4</sup>：

- 16 杜司马祠百五十三斛 [ ]六斛
- 17 [孙]国长六斛 王模六斛 路晁六斛 范周会五十九斛
- 18 □□十八斛 荆佛须十一斛 张玄通四斛五斗 宋棱四斛五斗
- 19 □□□斛五斗 令狐男四斛五斗 田盘安六斛 成崇安四斛五斗
- 20 [四]斛五斗 唐暖四斛五斗 除□□、范周会、宋□
- 21 右十八家费合三百七十斛出献系（丝）五斤

再引一段《高昌计口出丝帐》<sup>5</sup>：

（前缺）

- 1 孙属十三口 张万长四口 窦虎[ ]
- 2 一一右廿五家口合百六十出系（丝）十斤田七子[ ]

关于《高昌计费出献丝帐》，研究者认为其性质为户调征收。户调自其创制之后就征收丝织品，所以《高昌计费出献丝帐》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并无特殊之处。至于《计口出丝帐》，据研究其性质为口税征收。如所周知，汉代的算赋和口赋是征钱的。大凉高昌时代的口税征收丝，这是当时丝绸充任货币及纺织品本位政策的突出表现。而到麹氏高昌时代（502-640年），其所征收的“丁正钱”是银钱。将《计口出丝帐》放在前后的历史脉络中，就可以凸显出它的特点，即它不是像前后时代那样征收钱币，而是丝绸。这或许说明高昌当地开始较大规模地生产丝绸，因而使得丝绸成为赋税征收的对象，《计费出献丝帐》和《计口出丝帐》应当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证据之一。至少到大凉高昌王国时期，高昌地区已经有丰富的丝织业，每户、每个纳税人丁都离不开丝绸。丝绸之路上丝绸的向西贩运，中原地区无疑是最大的供应产地，但从长安、洛阳以西，至少在于阗、疏勒以东，每一个丝路城镇也都是一个大小规模不等的丝绸生产地，其中高昌地区应当比较早地成为一个重要的丝织品供应地。

<sup>3</sup> 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146—151页；韩国磐《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来看高昌的丝绵织业》，《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344—356页；陈良文《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高昌唐西州的蚕桑丝织业》，《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118—125页；武敏《从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地区的蚕丝与纺织》，《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92—100页。

<sup>4</sup>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278—281页。

<sup>5</sup>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284页。关于以上两件文书的详细分析，见裴成国《吐鲁番新出北凉计费、计口出丝帐研究》，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7—117页；孟宪实《论十六国、北朝时期吐鲁番地方的丝织业及相关问题》，《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97—227页。

到了7世纪20年代，当玄奘离开高昌国向西天取经时，佞佛的高昌王鞠文泰为玄奘的西行准备了丰厚的行装：法服三十套，防寒的面衣（脸罩）、手衣（手套）、靴袜等数十件；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和绢等丝织物五百匹，作为法师往返二十年的费用；马三十匹，仆役二十五人；又写了二十四封书信，每封信附有大绫一匹，请高昌以西龟兹等二十四国让玄奘顺利通过；最后，又带上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献给当时西域的霸主西突厥叶护可汗，并致书请可汗护送玄奘到印度求经<sup>6</sup>。从这份物品单中，也可以看出高昌王国所囤积的丝织品是如此之多，这500匹的高档丝织品随着玄奘的西行，而消费在丝绸之路的某些段落当中；而送给西突厥可汗的另外500匹高档丝织品，可能会被帮助可汗经营商业的粟特人倒卖到更西的伊朗、甚至拜占庭地区。

高昌国的丝或丝织品也从家庭或官府投放到市场，吐鲁番阿斯塔纳第514号墓葬发现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sup>7</sup>，是麹氏高昌国某年从正月一日到十二月末高昌市场中的货物交易双方向官府所交的进出口贸易管理附加税，名为“称价钱”。在整个三十多笔交易中，买卖双方主要是康、何、曹、安、石五姓的粟特人，卖者当来自西方，买者在高昌本地，但双方都是粟特人。买卖的商品有金、银、丝、香料、郁金根、硃沙、铜、鎗石、药材、石蜜，除了粟特商人向西贩运的丝之外，大多数是西方的舶来品。这里把有关丝的条目摘出：

- 6 𪛗买（卖）系（丝）五十斤、金二十两，与康莫毗多二人边得钱七文半。  
 29 即日，康□𪛗买（卖）系（丝）十斤，与康显𪛗二人边得钱一文。  
 35 □日，何刀买（卖）系（丝）八十斤，□□𪛗门𪛗二人边得钱八文。  
 37 起五月二日，车不吕多买（卖）系（丝）六十斤，与白𪛗门𪛗二人边得钱三文。

由此可见，丝和丝绸是丝绸之路上与金银铜等贵金属、香料、药材同等重要的东西。目前所见“称价钱”文书只是非常偶然的发现，因此我们今天所不知道的类似贸易一定还有很多次，举一反三，我们不难想象高昌作为丝和丝织品的中转站，在丝绸之路上所起到的作用。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吐鲁番出土的《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这是盛唐时期高昌（当时称作交河郡）市场上各行出售商品的预估物价表，由池田温先生根据121件残片复原为两组，分别是当年七月二十一日和八月三日的市估案，两者的物品基本相同，估价略有参差，以下如物品相同，只取其一。其中“帛练行”和“綵帛行”残存的记录有<sup>8</sup>：

#### 29 帛 练 行

30	大 练 壹 匹	上直钱肆伯柒拾文	次肆伯陆拾文	下肆伯伍拾文
31	梓州 小练 壹匹	上直钱叁伯玖拾文	次叁伯捌拾文	下叁伯柒拾文
32	河南府生 纁壹匹	上直钱陆伯伍拾文	次陆伯肆拾文	下陆伯叁拾文
33	蒲 陕州 纁 壹匹	上直钱陆伯叁拾文	次陆伯贰拾文	下陆伯壹拾文
34	生 绢 壹 匹	上直钱肆伯柒拾文	次肆伯陆拾文	下肆伯伍拾文

<sup>6</sup> 慧立、彦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18、21页。参看孟宪实《唐玄奘与鞠文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89—101页。

<sup>7</sup>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450—453页。

<sup>8</sup>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448—450页、

35	纁	紫	壹	匹	上直钱伍伯陆拾文	次伍伯伍拾文	下伍伯肆拾文
36	纁	绯	壹	匹	上直钱伍伯文	次肆伯玖拾文	下肆伯捌拾文
52	綵	帛	行				
53	紫熟	绵绫	壹	尺	上直钱陆拾陆文	次陆拾伍文	下陆拾肆文
54	绯熟	绵绫	壹	尺	上直钱陆拾[	]	下伍拾伍文
56	杂色	隔沙	壹	尺	上直钱拾肆文	次[	]
57	夹绿	绫	壹	尺	上直钱拾陆文	次[	]
58		]	純	壹	尺	上直钱[	]
59		]	純	壹	尺	上直钱[	]
61	晕	綢	壹	尺	上直钱[	]	次拾捌文 下拾肆文
62	丝	割	壹	尺	上直钱叁拾陆文	次叁拾伍文	下叁拾肆文
63	燠	割	壹	尺	上直钱拾陆文	次[	]
64	杂色	鞍褥	表	壹	上直钱[	]	
65	细	绵	绉	壹	尺	上直钱肆拾柒文	次肆拾伍文 下肆拾肆文
66	次	绵	绉	壹	尺	上直钱肆拾贰文	次肆拾文 下叁拾捌文
67	麤	绵	绉	壹	尺	上直钱叁拾柒文	次叁拾伍文 下叁拾文
68	细	縠	壹	尺	上直钱肆拾伍文	次肆拾肆文	下肆拾叁文
69	次	縠	壹	尺	上直钱叁拾文	次贰拾伍文	下贰拾文
70	麤	縠	壹	尺	上直钱拾文	次壹拾文	下[
71	縠	鞋	壹	量	上直钱叁拾文	次贰拾柒文	下[
72	縠	花	壹	斤	上直钱柒文	次陆文	下[
75	益州	半臂	段	壹	上直钱肆伯伍拾文	次肆伯文	下叁伯伍拾文
76	绯	高布衫	段	壹	上直钱壹阡叁伯文	次壹阡贰伯文	下壹阡壹伯文
77	紫	高布衫	段	壹	上直钱壹阡肆伯文	次壹阡叁伯文	下壹阡贰伯文
78	帛	高布衫	段	壹	上直钱玖伯伍拾文	次玖伯文	下捌伯伍拾文

池田温先生对此做过仔细的分析，他指出，这里布帛类的大多数是从中原内地运送过来的，其中不仅有初级产品，还有经过剪裁加工后的成品。他说：“总而言之，不仅被当作流通媒介的布帛大量流通，而且种类繁多的纺织品、衣类也都从遥远的各地运到了交河郡，只要交河郡的消费者肯花钱就能够从市场上买到中意的衣料。”他还提示《市估案》中罗列的商品，有源自东海、朝鲜半岛的昆布，有原产印度的庵磨勒，有源出中国西南地区的麝香，有热带或亚寒带出产的香料、犀牛，“凡唐人所知道的贵重药材都能在交河郡市场买到”<sup>9</sup>。如此丰富多彩的市场，绝非仅仅是供给交河郡当地的百姓或军人，而更有购买力的人应当是东西往来的商人，其中各种丝织品购买者则更多的应当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商人。这件只有两天市估内容而且非常残破的文书已经说明丝绸在当时的丝绸之路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

<sup>9</sup> 池田温《中国古代物价初探——关于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断片》，韩昇汉译文，《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2—189页，引文在161—162页。Eric Trombert et É. de La Vaissière, “Le prix des denrées sur le marché Turfan en 743”, Jean-Pierre Drège (éd.), *Études de Dunhuang et Turfan*, Genève, Droz, 2007, pp. 1-52 也详细译注并分析了这件《市估案》，可以参看。

果西州到交河郡时期的市估案都保存下来，那我们对于当年丝路城市高昌市场的认识，对于各种丝织品作为商品在这里销售情况的认识，就会更加详细而且丰富多彩了。

到了晚唐、五代、宋初时期，虽然从中国通向西北地区的道路不像盛唐时期那样通畅，但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完全断绝，丝绸之路上阶段性的道路还是继续通畅的，如敦煌与于阗、敦煌与西州回鹘王国之间，基本上一直是通畅的；敦煌与甘州回鹘、敦煌与中原王朝之间，有时被中间的部族阻隔，有时则是通畅的。另外，官方使者之外的佛教徒，因为各个王国都信奉佛教，因此并不受到特别的阻拦。不属于敌对政权的商人，应当可以通过不同王国、部族间的道路，来作这些国家、部族交易的买卖中间人，只是这方面的记录不够多而已。

在敦煌藏经洞中无意保存下来的文书里，我们仍然能够得到一些丝绸之路上以不同形式交流的丝绸的消息。P.2638号《后唐清泰三年（936）六月沙州觀司教授福集状》第42行载：

破用数，楼机绫壹匹，寄上于阗皇后用。<sup>10</sup>

这时正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德统治时期，这位于阗皇后就是曹议金女儿、曹元德的姊妹，在934年嫁给了于阗国王李圣天（Viśa' Saṃbhava, 912—966年在位）<sup>11</sup>。本文书所记事项，就是沙州僧团根据归义军官府的指令，出楼机绫一匹，寄给于阗皇后使用。所谓“楼机”，是指高楼束综提花机<sup>12</sup>。楼机绫织造工序复杂，织物的图案精美豪华、价格昂贵，所以是敦煌地区上等的丝织品，非一般人所能使用<sup>13</sup>。

Дх.1380《某年（934—935年间）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致女于阗皇后书》记<sup>14</sup>：

今大王信，摩睺罗锦一匹，小绫一匹，夫人楼机

“信”这里指信物，有大王所送的摩睺罗锦一匹、小绫一匹，夫人送的楼机绫，可能也是一匹。从“父大王”的称呼来看，这件书信的收信人最有可能的就是曹议金嫁给于阗国王李圣天的女儿，也就是P.2638文书中的“于阗皇后”。

Дх.1265+Дх.1457《沙州某人上于阗押衙张郎等状》记录了从沙州送至于阗的丝织品为“绯绵绫壹匹，紫绵绫壹匹”<sup>15</sup>。

以上三个例子都是沙州寄赠给于阗方面的丝织品，这也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物质文化交往的一种方式。

P.t.1106藏文文书正面是《于阗王天子长兄（李圣天）致沙州弟登里尚书（曹元忠）书》，其中提到“作为购买五十……汉地丝绸之回赠（物品）”<sup>16</sup>，虽然没有具体说是何种丝绸，

<sup>10</sup> 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649页。

<sup>11</sup> 关于这位于阗皇后及其出嫁时间，参看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33—34、300—302页。

<sup>12</sup> 王进玉《敦煌学和科技史》，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458—467页。

<sup>13</sup> 童丕著，余欣、陈建华译《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103、108页。

<sup>14</sup> 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6页。

<sup>15</sup> 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43页。

<sup>16</sup> 图版见 A. Spanien et Y. Imaeda,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omplé par quelques manuscrits de l'India office et du British Museum*, II, Paris 1979. pls. 446-447. 研究见 G. Uray, “New Contributions to Tibetan Documents from the post-Tibetan Tun-huang”,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但表明是一笔数额不小的官方贸易。

P.2958 于阆语文书中包含有几封书信的草稿，其中第 6 封信是一位自称为“朔方王子”的人（Hva Pa-kyau）上于阆朝廷书，这位王子其实是从于阆出发，经沙州、朔方到中原朝贡的于阆王子，但由于道路险阻，他没有能够前往朔方，而是停留在敦煌。他信中提到一位于阆使者 Hvaṃ Capastaka（王子之一）根据于阆朝廷的指令，用 30 斤玉与归义军官府换取了 200 匹丝绸（śacu）<sup>17</sup>，其中 150 匹给予阆朝廷，50 匹给母后 Khī-vyaina。在第 7 封信中，Hva Pa-kyau 重申了上述 Hvaṃ Capastaka 用 30 斤玉与归义军官府换取 200 匹丝绸的事情，并希望母后能多给他一些玉石，以便换取更多丝绸<sup>18</sup>。

由此可见，在公元 10 世纪时，位于塔里木盆地西南的西域大国于阆仍然对汉地的丝绸有着极大期望，尽管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于阆当地很早就能够养蚕缫丝，但汉地丝绸的质量一定优于当地所产，或者花纹样式更加时尚，因此为于阆王族所喜爱。

以上这些零散而且完全偶然留存下来的书信、牒状一类的文书材料，给我们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般的丝绸之路上丝绸流通的信息，从文献留存的情形推断，真正的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交流的情况一定要比这些记录要频繁、广阔。我们历史学家不能仅仅相信偶尔留存下来的纸头上的信息，而应当由此及彼地加以推想，来重构当年丝绸之路的伟大，来想象丝路之绸的丰富多彩。

（原载赵丰主编《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9，16-22 页）

---

of the 4<sup>th</sup>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Schlosse Hohenkammer - Munich 1985, eds. H. Uebach & J. L. Panglung. München: Kommission für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8, pp. 520-521; 荣新江、朱丽双《一组反映 10 世纪于阆与敦煌关系的藏文文书研究》，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 辑，科学出版社，2012 年，101—102 页。

<sup>17</sup> H. W. Bailey 认为于阆文 śacu 音译自汉文的“蚕丝”，代指丝绸，见所著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94.

<sup>18</sup> H. W. Bailey, “Altun Khan”, *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XX.1, 1967, pp. 97-98.